

后，共产党员、农学院学生陈万堂和“文学笔会”中的进步同学，酝酿着下乡开展反蒋武装斗争。7、8月间，陈与李安澜、罗永由等首先去大邑地区，参加武装斗争。1947年底至1948年初，中共川康特委决定在大邑、邛崃地区成立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由特委所属雅乐工委领导。川大一些进步学生先后几批到武工队参加斗争，成为骨干队员。在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影响下，武工队的工作发展到温江、雅安地区二十余县。与此同时，党组织还先后派李江景、何富华、杨俊、冉正芬去川北农村开展工作。次年又派何懋金、郝跃青、蒋开萍作为川东特遣组，到万县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从事武装斗争。

1949年春，中共成都市委领导同志撤离成都以前，就向川大党组织传达了“储蓄力量，迎接解放”的指示。因而，川大党组织在利用国共和谈时机开展尊师运动时，估计到和谈必定破裂、敌人要下毒手，已开始作好撤退、转移的准备。最先通过市委关系，川大党组织派华文江与邛崃、大邑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周鼎文接上头，接着又派唐思明前去作好撤退的具体准备。3月中旬，尊师运动高潮时，即将已被敌人注意的一批同志陆续撤至邛、大地区。当时川大党组织决定：凡在斗争中已暴露的民协、火星成员应即撤退；已被敌人注意的进步同学，也应说服并帮助他们撤离。民协会员谁走谁留，由小组讨论，经区代表同意，干事会批准。撤退地点，主要靠自己投亲靠友或回老家；自己无路可退的，由组织安排去邛、大地区。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撕下了“和谈”的假面具，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民党反动派在抛开和平伪装的同时，加紧了对国统区民主力量的法西斯镇压；是日深夜在成都进行了大逮捕。川大一些进步学生被捕。党组织和民协干事会立即作了撤退的紧急部署，一面开展营救工作，一面有计划地撤退。4月至9月先后撤退至川西、川南和成都地区的川大革命师生达二百多人。撤退之后，川大党组织派人前往分头联系，他们与当地革命力量一起，有组织地开展武装斗争和迎接解放的工作。

由组织成批地安排去川西边临工委领导下的游击队的川大学生近百人。他们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发

动农民抗租抗粮，开展武装斗争，在中心地区的大邑三岔、玉泗一带，村村都有川大学生。不少同志成为由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扩大而成的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的领导骨干。其人数之多，时间之长，斗争之艰苦，实为少见。

4月前后撤至简阳、石桥一带的同志，党组织派华文江前去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地学校团结师生，并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不久，华文江调走，由付昭忠负责领导。

7月前后，华文江被调到乐山地区，将沐川、乐山、青神、马边、犍为一带的同志组织起来，以沐川为据点，发展了一批党员、“民协”会员，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这些同志与当地党组织配合，建立了川西南军区游击队，人数达1,200多人。临解放时，他们阻击国民党溃军，捕获一批特务。撤至广汉、金堂、中江、盐亭、德阳、什邡、蓬溪、乐至一带的同志，主要是火星社的社员，也有部分民协会员。党组织派袁邦民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了学校、统战和策反等工作。他们在广汉民盟工作的基础上，深入农村，建立农民互助会，发展会员200多人，掌握近百条枪枝，策反国民党武装力量，使广汉等县和平解放。

7、8月间，川大先后撤至雅安、荣经、天全、芦山、宝兴一带的30多名学生，在川大党组织先后派到雅安的邹永刚、蒙绍全与一年前就在这里开展工作的原华西协中民协负责人、共产党员刘光烈一起组织的领导小组（蒙绍全是主要负责人）领导下，与当地党组织和民盟相互配合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到刘文辉军部担任政工人员，在农村建立农会，在工厂组织工会并组织人民武装，配合解放军阻击国民党残部。

撤至西昌的民协会员李时芳、贺淑贞、陈祥德，由李时芳（党员）负责，与西昌党组织取得联系，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并打入敌人内部，作瓦解工作，发展民协会员39人。

撤退至成都市区的一些民协会员，由赵令哲、尹大成等人负责联系，进行活动。蒙绍全（不久离开）、任世询、张月华组成民协领导小组，分工负责领导。这些民协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家庭教师或各种社会职业为掩护，作各阶层的宣传工作、思想工作，如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和育婴堂等单位，作城市贫民、家庭妇女的工作。

还有一些民协会员回到家乡或撤至外地，由于地广人分散，组织上未能一一派人联系，但他们大多数都在当地利用一切条件，独立开展工作。如撤到蒲阳发电所的民协会员刘培清等，在该所发展了一批民协会员，掌握了该厂的武装，建立了护厂队，使解放时电所免遭破坏。

总之，从1949年4月至9月，川大革命师生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农村和社会中去，这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革命师生从学校走向社会，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参加了当地的各种革命活动，特别是深入农村，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迎接解放做出了贡献，同时又使他们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迅速成长，为党培养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

## 二、中美合作所殉难的川大烈士

四川大学，这所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西南最高学府，在四十年代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中，也出现了一批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献身的革命烈士。

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牺牲的川大校友有江竹筠、马秀英、李惠民、何懋金、郝跃青、蒋开萍、张国维、胡其恩、黄宁康等九人。

名扬中外的渣滓洞烈士江竹筠，早在1939年秋就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安排，1944年秋考入川大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次年转入农艺系），在校用名江志炜。这位出身贫苦、当过童工的女共产党员，生活简朴，学习刻苦，各科平衡发展，成为班上成绩较好的学生之一。

在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中，按党的要求，她不直接抛头露面，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她入学的第一学期，即参加了民协，后又参加了进步学术团体女声社、文学笔会，都是一般成员。江竹筠按照党对地下工作者“勤学、勤业、勤交友”的要求，善于与觉悟程度各异的的同学相处。她关心、帮助同学，无微不至；她通过言谈、举止和琐事，给同学以启迪、感染，从不强加于人。有一次她和同学谈起苏联电影《丹娘》说：“丹娘最勇敢，她从容就义，宁愿死，啥都不肯说。”一次，江竹筠同一位安徽籍的进步同学说：“革命是艰巨的事业，难免有牺牲，贪生怕死的人是不能干革命的。如果被捕了，千万不可牵连别人。对敌人的审问，

最好的答复是什么都不知道。”

江竹筠在川大度过了很有意义的两年学习生活和战斗生活。经党组织决定，于1946年暑期回重庆，参加新的战斗，投身汹涌澎湃的革命激流，活动于重庆、万县、云阳等地。1949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的当天早晨，她还给川大一位同学写了封信，说她想回川大。在狱中，她以丹孃为榜样，受尽多种酷刑，履行着她的斗争格言：“对敌人的审讯，最好的答复是什么都不知道。”她对特务徐远举说：“要我的命，有；要我的组织，没有。”她坚持狱中斗争，坚贞不屈。同狱难友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向江姐献词：

你是丹孃的化身，  
你是苏菲亚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与江竹筠关在同一监狱里稍后殉难的马秀英、李惠民<sup>①</sup>烈士，是在川大成长起来的另两位丹孃。马秀英受其叔父、中共党员马识途的影响，一进川大就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参加了自由读书会，后来又参加了黎明歌唱团，并且参加民协、中国共产党，被女同学推选作过女生伙食团团长。1946年底马识途任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时，她协助马识途、王琴舫担任机要联络工作。毕业后任广汉女中训育主任，半年后去重庆江北复兴场志达中学作文史教员。在重庆，她认识了原西南联大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齐亮，结为夫妇，婚后仅三天，即于1949年1月先后被捕，被关进渣滓洞监狱，于“一一·二七”大屠杀中牺牲。李惠民作过女声社负责人，又是离离草社的发起者之一。她先加入民协、共产党，后加入民盟。毕业后在重庆与川大同学张国维一道从事地下工作。于1949年4月10日与张国维一起被捕，牺牲于渣滓洞“一一·二七”大屠杀中。

在渣滓洞牺牲的还有川大男同学何懋金、郝跃青、蒋开萍、

<sup>①</sup>马秀英，四川忠县人，1943年考入川大经济系，1947年毕业。李惠民，四川大邑县人，1943年考入川大史地系，1947年毕业。

张国维<sup>①</sup>烈士。何懋金入川大前就结识了《新华日报》社的何其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来川大后，他与全国学联保持着单线联系；领导过黎明歌唱团，在历次学生运动中起骨干作用。1947年任川大党支部委员、民协干事。“四·九”运动中冲在斗争最前列，嗣后奔赴重庆各大中学，组织声援斗争。后受组织派遣到万县从事农民运动、武装斗争，1949年3月2日被捕。郝跃青是何懋金的同乡人，富于正义感，积极参加声援市中受害同学的示威游行，在悼念昆明“一二·一”烈士时痛哭失声。他揭露特务学生策划的反苏游行，劝告不明真象的同学“不要盲从”。他是民协会员，参加了自然科学研究社、黎明歌唱团。在“四·九”血案中，他冒着危险，带领厨工给被捕同学送饭。后同何懋金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并由何介绍入党，1949年4月被捕。蒋开萍是中共党员，民协会员，黎明歌唱团团员，积极参加川大保障人权运动和“四·九”运动，与何懋金、郝跃青一道到万县，利用自己在万县的社会关系开展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被捕后英勇不屈，三人同时在“一一·二七”大屠杀中牺牲。

张国维先加入民盟，后加入共产党，是历次学生运动的骨干。1948年4月10日在重庆与李惠民一道被捕，囚禁于渣滓洞监狱。他在特务徐远举审讯时骂徐是“九头鸟”，受重刑，狱中装“神经病”，在“一一·二七”大屠杀中牺牲。

在渣滓洞殉难的川大校友中，还有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被定为烈士的胡其恩、黄宁康。<sup>②</sup>胡其恩1940年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的农经系。在校内倾向进步，阅读《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等进步书籍，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认为国民党腐败无能，非推翻不可。”1946年初，他在成都工作时，参加了党领导的“职业联谊会”，经常回母校参加反蒋反美爱国活动。“四·九”血案发生后，他给母校受害同学写了一封慰问

---

<sup>①</sup>何懋金，四川万县人，1945年由金陵大学转入川大农经系，1948年毕业。张国维，湖北汉川人，1942年考入川大经济系，1946年毕业。郝跃青，四川万县人，1944年考入川大物理系，1948年毕业。蒋开萍，四川万县人，1945年考入川大政治系，1949年毕业。

<sup>②</sup>胡其恩（1919—1949），又名胡佑。胡毓，四川简阳人。

信，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表示给受伤住院的同学以经济支援，不幸信件落入特务手中，被关入渣滓洞。在狱中，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斗争，成了单线传递消息的秘密联络员，与共产党员余祖胜（即《红岩》的余新江）关系密切。“一一·二七”牺牲前，用牙刷柄磨成一颗红心形状，以示热爱党，忠于人民的红心至死不变。

### 三、十二桥牺牲的川大烈士

1949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南、北三面合围，进入四川，直逼成都，国民党残兵败将将被围困于川西盆地，面临灭顶之灾。这时，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奉蒋介石之命，在歌乐山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后，又飞窜成都，策划成都大屠杀。12月7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青羊宫十二桥灭绝人性地惨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32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桥惨案”。在这次惨案中，四川大学校友杨伯恺、王干青、张大成、余天觉、缪竞韩、田中美、方智炯、黎一上、王建昌等九人英勇就义。三天前，另有三名烈士被害于外西抚琴台，其中刘仲宣烈士也是川大校友。

杨伯恺<sup>①</sup>烈士二十年代初赴法勤工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委员、中法大学教务长，积极从事党的工作。1929年底应成都大学校长张澜之聘，来成都大学任教。次年底，因党领导的广汉起义失败，杨伯恺被通缉，被迫离蓉赴沪。在上海，他扩办辛垦书店，出版进步书刊，潜心译著。抗战爆发后，回四川从事党的上层统战工作。1938年任成都协进中学教务主任，组织抗日进步团体，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自四十年代以来，烈士为《华西晚报》撰写了评论，宣传民主，评击时政。所写评论观点鲜明，笔锋犀利，常为《新华日报》所转引。1944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在成都“六·一”大逮捕中不幸被捕。杨伯恺烈士在狱中度过了两年零六个月的铁窗生活。在敌人审讯面前，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他不畏强暴，挺身保护狱中难友。烈士的言行，赢得了难

<sup>①</sup>杨伯恺（1894—1949），原名杨洵，又名杨道融，四川营山人。

友们的尊敬，被誉为“狱中的精神堡垒”，“在狱中不肯觅保释放的老英雄，斗争里从不妥协的老烈士！”<sup>①</sup>

王干青<sup>②</sup>烈士，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毕业，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38年间。作为川军刘湘部驻延安代表驻节延安。此后，长期从事党的上层统战工作。1949年11月在成都被捕。刘仲宣<sup>③</sup>烈士，四川法政学堂毕业。在任金堂县长期间，因严惩烟赌匪，结怨于地方恶霸势力，遭受诬陷，被囚禁于成都宁夏街监狱。在狱中，受到中共党员杜可教育，参加“在监工作组”，1949年6月获释，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2天后被捕，12月3日就义于外西抚琴台。烈士们在狱中高风亮节，不惧淫威，临死不屈，表现了革命者的浩然正气。

余天觉<sup>④</sup>、缪竞韩<sup>⑤</sup>、方智炯<sup>⑥</sup>、田中美<sup>⑦</sup>烈士均是四川大学法律系进步学生，余天觉、方智炯为民盟盟员，田中美为中国火星社社员，缪竞韩为民协成员，他们都是解放战争后期川大学生运动的骨干。在“四·九”运动和纪念“四·九”一周年的活动中，表现积极，站在斗争最前线。余天觉担任纪念“四·九”周年晚会大会主席，又在自编讽刺剧《灵官扫台》中扮演灵官，对王陵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又如在“四·九”营火晚会上深受观众喝采的、绘声绘色刻画敌人狰狞面目的文艺节目《祭戡乱建国委员文》，就是缪竞韩烈士笔下之作。他揭露蒋介石：“纪念周，无非是，装模作样。读遗嘱，也等于，官样文章。”“刮地皮，天良尽丧。”“争防地，各动刀枪。”“抗战完，又打内仗。”“多少人，受饥饿，流浪他乡。学生们，变成了，屠杀对象：或殴打，或捆绑，如驱犬羊。还说是，讲民主，圣恩浩荡。却等于，放狗屁，鬼闹一场。”他讽刺伪国大：“开国大，选代表，奇花异样。会场上，充满了虎豹豺狼。”“被选出，却要

①《川大追悼殉难烈士》，载《工商导报》1950年1月18日。

②王干青（1890—1949），四川绵竹人。

③刘仲宣（1890—1949），四川南江人。

④余天觉（1925—1949），四川涪陵人，1946年考入川大法律系。

⑤缪竞韩（1926—1949），四川威远人，1946年考入川大法律系。

⑥方智炯（1923—1949），湖北松滋人，1947年考入川大法律系。

⑦田中美（1926—1949），四川泸县人，1947年考入川大法律系。